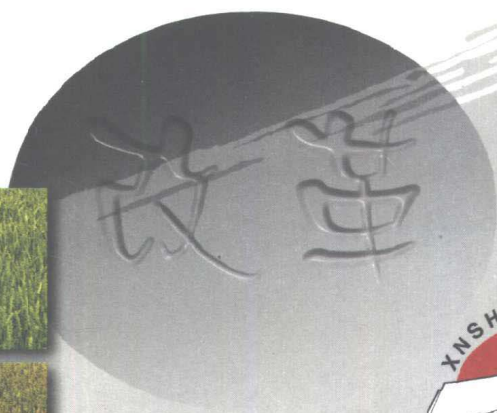


中外农村教育的发展与改革

徐 辉 黄学溥 等著

ZHONGWAI NONGCUN JIAOYU DE FAZHANYU GAIGE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国家教委“九五”重点课题“西南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综合问题研究”资助项目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国家教委“九五”重点课题“西南贫困地区少数民族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综合研究”资助项目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中外农村教育的 发展与改革

徐 辉¹¹²⁰⁵⁵黄学溥 等著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外农村教育的发展与改革/徐辉等著.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1

ISBN 7-5621-2456-6

I. 中... II. 徐... III. 乡村教育—研究—世界
IV. G7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8763 号

责任编辑:康莉蓉

封面设计:王 煤

中外农村教育的发展与改革

徐 辉 黄学溥 等著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 北碚)

四川外语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625 字数:292 千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000

ISBN 7-5621-2456-6/G·1446

定价:18.00 元

第一章 中国农村教育的发展与改革	(1)
第一节 中国古代农村教育的发展	(1)
第二节 中国近代农村教育的发展	(8)
第三节 中国现代农村教育的改革	(26)
第二章 美国农村教育的发展与改革	(59)
第一节 美国农村教育研究概况	(59)
第二节 美国早期农村教育的演变	(61)
第三节 南北战争后的农村教育	(77)
第四节 战后农村教育的建设与改革	(93)
第五节 美国当代农业教育的改革	(115)
第三章 丹麦农村教育的发展与改革	(127)
第一节 丹麦农村教育的历史演变	(128)
第二节 格隆维与民众高等学校的建立	(129)
第三节 农村的小学与初级农业学校	(142)
第四节 农业学校和家政主妇学校	(147)
第五节 农村成人教育	(150)

第六节	丹麦为农村现代化所做的努力	(156)
第四章	印度农村教育的发展与改革	(160)
第一节	印度农村普及义务教育	(160)
第二节	印度的农民教育	(176)
第三节	印度农村中小学职业技术教育	(183)
第四节	印度中、高等农业教育	(189)
第五节	影响印度农村教育发展的因素	(196)
第五章	苏联农村教育的发展与改革	(212)
第一节	苏联农村教育的初创时期	(212)
第二节	苏联农村教育的大发展时期	(214)
第三节	苏联农村教育的调整改革时期	(228)
第四节	苏联农村教育的巩固完善阶段	(240)
第五节	苏联农村教育全方位改革时代	(262)
第六章	英国农村教育的发展与改革	(288)
第一节	英国农村教育的发展	(288)
第二节	英国农村教育的改革	(314)
第七章	日本农村教育的发展与改革	(322)
第一节	日本农村教育的初步发展阶段	(323)
第二节	日本农村教育的正规化阶段	(327)
第三节	战后农村教育的改革与重建阶段	(336)
总 结	外国农村教育发展与改革的历史经验 ...	(357)
后 记		(367)

中国农村教育的发展与改革

第一节 中国古代农村教育的发展

一、农村教育的产生和形成

自从有了人类社会,便有了人类的教育活动。然而,在漫长的原始社会里,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社会组织简单,城市还没有出现,教育是和整个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结合在一起的,没有城市教育与农村教育之别。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类生存环境的改善,人类逐渐进入了牧猎——农耕时代,教育也有了相应的发展,这时的教育可说是原始社会的农村教育。单就城市教育与农村教育的起源看,农村教育应该说远远早于城市教育。中国的情况也不例外。

在夏商以前,中华民族的远古先民由采集经济到渔猎经济,进而到种植(农业)经济,教育也由教民“钻木取火”到“教民以猎”,进而“制耒耜,教民农作”,并由“结绳而治”到“易之以书契”。

在夏商时代,我国不仅有了国学,而且已出现了乡学。《礼记》的《王制》和《内则》专门论述了国学的情况,认为分为两类,即“东

序”和“西序”。关于乡学,《孟子·滕文公上》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又据《史记·儒林外传》记载公孙弘和太常博士臧平等,曾议及三代为学之道曰:“乡里有教,夏曰校。”这是说校为乡学。朱熹在《四书集注》中也指出庠、序、校皆为乡学。至春秋时期郑国还有乡校的设置。根据以上论述,夏代校为乡学,大致无错。

商代是我国奴隶制社会的发展时期,出现了地域性组织如邑、郊、牧、野等,国家制度更为完备了。农业方面已实施井田制,已有公田与私田之分。当时世人嗜酒成风,这反映了农业生产的发达。畜牧业在商代经济生活中也占有重要地位,马、牛、羊、豕、犬、鸡等已俱全。从农牧业生产的状况,我们不难想象商代农业生产劳动教育的活跃。

西周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村教育逐渐初具雏形,《礼记·学记》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遂有序,国有学。”

在西周,乡学是地方学校,按地方行政区划设立,地方区域的大小不等,设学也有不同名称,如上述的塾、庠、序、校等。从具体施教的情况看,有学者考证:“地方学校,名称颇多……每值春初,村中男女老幼,自早即前往听讲,至晚始归。”^①这可说是当时农村教育的真实状况。

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代,随着“经济下移”、“政治下移”,“学术下移”也出现了。学术下移就是打破官守学业的牢笼,把礼下于庶人,让学术“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变为私有的“百家之学”^②。这无疑有利于当时农村地区教育的发展。随着私学的兴起,出现了儒、墨、道、法、名、农诸家,“从师”成

^① 李建兴:《中国社会教育发展史》,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1986 年版,第 18 页。

^② 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45 页。

为一时的风尚,农家许行有“徒数十人”^①。《汉书·艺文志》云:“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周初由地官司徒总管农业和教育,下设农稷、农正、农师、司稼、遂人、草人、稻人等中下级官吏专管农业,他们都是世代相传的农业专家。周朝衰落后,这些人流散民间,设学收徒,著书立说,组织学派成为农家。

在农业科技教育内容方面,农学派的专著《神农》、《野老》相继问世,总结了当时农业生产的经验,可惜早已散失。《吕氏春秋》保存了四篇出自农家之手且为学术界公认的农学著作,它们是《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基本上反映了当时农业科学技术的水平,对农业生产中的土、水、肥、种、管理、时令等问题,都做了科学的概括。此外,一些儒家经典如《诗经》、《周礼·地官》、《孟子》、《荀子》、《尔雅》等,虽非农学著作,也对农业科技知识进行了总结、概括,如《诗经》中的《豳风·七月》利用诗歌的形式,概括了在一年四季的气候变化中,农业生产由耕种、管理到收藏的全过程,集中总结了我国古代“观象授时”的农业生产经验。

二、农村教育的确立与巩固

秦汉时期官私并立的农村教育体系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农村教育的确立。秦统一后,重视法治,当时政教合一。但法治政策的推行,必须在施政时也随同施教,所以,在乡设三老,以掌教化。“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②至于三老之人的资格,也有规定:“举民年五十以上,有脩行,能率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

^① 《孟子·滕文公上》。

^② 李建兴:《中国社会教育发展史》,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版,第36页。

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①

汉代的官学分中央官学与地方官学两种,包括初等教育(庠、序)、中等教育(学、校)和高等教育(太学)三级,以儒学为主体,官立学校为主干。在农村,主要有三种类型的私学:一是以书馆为主要形式的蒙学教育,在程度上它属比较低的水平,教师称“书师”,学习的主要内容为识字、习字。书馆又分两类,一种是书师在家室或公共场所坐馆施教,附近学童入馆就学。另一种是贵门官户聘书师来家施教,本家或本族学童在家受教,也叫“家馆”。二是以“乡塾”为主要形式的一般经书学习,教学要求是对经书“粗知文义”或“略通大义”,不要求有精深的理解,主要方式是“诵读”。三是以“精庐”或“精舍”为主要形式的专经教育,它带有研究与教育相结合的性质^②。汉代农村教育还有一种更为普遍的教育形式,这就是家学。家学所教内容十分广泛,程度也高低不一。有的只是启蒙教育;有的在父辈指导下,与诸兄弟一起诵读《论语》、《孝经》等一般经书;更多的是家学专经。家学中不仅传授知识、技能,而且讲究治学态度和方法,尤其重视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等伦理道德教育。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局动荡,官学时兴时废,私学盛行。其时的农村教育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处乱世,重门第,重视家庭教育。第二,官学衰败,社会教育稍兴盛。第三,九品中正选士制度,重乡邑清议,尚社会直道之风。第四,佛教寺院教育流行。第五,山林讲学蔚然成风。

隋唐以后,随着我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与繁荣,农业教育也逐渐完备,此时我国大多数人民都以农耕为业,农民生活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他们的简单生活知识、劳动技

^① 李建兴:《中国社会教育发展史》,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版,第36页。

^② 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二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09页。

能,世代相传,无需学校教育。其持家立业所需之少数应用文字,则主要从村中私塾学得。这种农村教育方面的史料,隋唐以前多不可考。宋元以后的村塾教育,以识字和书写为主,所用教材有《蒙求》、《千字文》、《太公家教》、《三字经》、《百家姓》等。

三、农村教育的演变

从宋代开始直到明、清,是古代农村教育的发展时期,随着中国封建制度的瓦解,古代农村教育也随之由盛转衰。这时期的农村教育,一方面积极维护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十分注重劝导生产。无论是乡学、私学,还是社学、庙学、义学等,都极力宣传封建伦常礼教、礼俗道德,培养顺民,出现了一些“乡约”、“宗规”、“家规”、“家训”以及一些有关农业生产方面的书籍。譬如“乡约”、“宗规”方面,明朝王守仁曾制订《南赣乡约》,明朝王孟箕曾订立《宗约会规》等等;“家规”、“家训”方面,北宋司马光撰写了《居家杂议》,南宋陆九韶写有《居家正本制用篇》等等;农业书籍方面,有元代大司农司的《农桑辑要》,明代王祯的《农书》、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明清时的《沈氏农书》、《农言著实》、《山居琐言》等。

宋朝初年,农村有乡党之学。“盖州县之学,有司奉诏旨所建也,故或作或辍,不免具文。乡党之学,贤士大夫留意斯文者所建也,故前规后随,皆务兴起。”^①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兴学,规定凡立学者可赐学田,这使得农村办学进一步兴盛。南宋时农村设有乡校、村学和冬学。陆游诗句云:“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着面看人。”他自注说:“农家十月,乃遣子弟入学,谓之冬学。所读《杂字》、《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宋朝私家设置或私人聚徒讲学的学校很多,它主要有两类:一

^① 《文献通考·学校考七》。

类是教授识字和日用基本知识的小学或蒙学,主要有宗族设立的义学,或富有人家的家塾。如苏轼幼年所入的小学^①,陈傅良应聘就教于瑞安林氏家塾等。学习内容一般是背书、授新书、作对、习字、读诗以及一系列的道德行为规范训练;蒙学教材有《急就篇》、《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另一类是为年龄较长、程度较高的农村青年学子设立的研究学问或准备科举的书院和经馆。

元代开办农村教育的一个重要措施是创立了社学。至元七年(1270年),元政府下令在全国立社。据《新元史·食货志》载:“先是大司农卿张文谦奏上立社,规条十五款。至元二十三年命颁于各路,依例施行。”元政府颁布了立社法令共114条,对社的体制和内容作了明确的规定,责令全国各地以自然村为基础编社。“诸县所属村疃,五十家为一社,择高年晓农事者立为社长。”“每社立学校一,择通晓经书者为学师,农隙使子弟入学。如学文有成者,申复官司照验。”这是由中央政府规定在农村基层组织“社”中普遍建立学校的起始,它是在元代农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条件下,是在以农产品为主要原料与商品的手工业和商业的刺激下,采取的普及农村教育的一种特殊形式,含有强迫入学的成分。教学一般只在农隙的时候进行,同时,它又含有很大比重的职业教育因素。社学的教师,必须是通晓经书的人。社学的教学内容,是让学生先读《孝经》、《小学》,再学习《大学》、《论语》、《孟子》以及经史等典籍,并适时教以农桑耕种等方面的技术知识,而且规定“社长专以教劝农桑为务”。使用的教材是大司农司编印的《农桑辑要》。据史载,1286年,大司农司上诸路社学为20,166所,1288年为24,400所。据《元史·地理志》的记载,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清查户口,共13,196,206户,58,834,711人。如按人数计算,平均2,410多人就建立一所学校。而且这个人口清查总数还包括全国城镇人口在

① 《东坡志林》。

内,可见当时农村教育已相当普及。

辽、金、元时私学灵活多样,开明、清家塾、义塾之先。这一时期的社会教化,在宋代奠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制度化,诸如“庙学”被广为提倡,《庙学典礼》被称为元朝学典。庙学专门宣传儒家的基本伦理道德学说,如同社学对于树立文明的社会习俗、风尚及对于传播先进的生产技术发挥了重大作用一样,庙学在民间也产生了相当大的道德和礼法教育的影响,促进了社会的相对稳定。

明朝建立后,明太祖在洪武八年(1375年)也诏令天下立社学,诏曰:“……乡社之民未睹教化,有司其更置社学,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导民善俗,称朕意焉。”^①于是,每50家设社学一处。明初社学主要由各级地方官吏兴办。据王兰荫《明代之社学》统计,在1,438所社学中,由知县建立的占61%强,由知州建立的占4%弱,由知府建立的占11%强,由提学官令监导建立的占21%强,其余少数由民间设立,这充分表明了明初社学官办的性质。社学的入学年龄一般在8~14岁之间。《香山县志》载:“年八岁至十有四者,皆入学。”《明史·杨继宗传》中也记载在杨任嘉兴知府期间大兴社学,“民间子弟八岁不就学者,罚其父兄。”社学的教学内容除教授传统小学所课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以及《孝经》、《四书》之外,还使民间子弟兼读御制大诰及明朝政府的律令。明代中叶以后,社学逐渐废弛,明朝政府虽多次明令复兴社学,各地官吏却大多视为“故事”,并不认真兴办。如“正统元年,令各地提学官及司府州县官,严督社学,不许废弛,其有俊秀者,许补儒学生员。”^②又,“弘治十七年,令各府州县建立社学,选择民师。民间幼童15岁以下者送入读书,讲习冠婚丧祭之礼。然其法久废,寝不举行。”^③明朝还有一些乡校、村校、义学、家塾以及私设的经

① 《续文献通考·学校考》。

② 《大明会典》卷七十八。

③ 《大明会典》卷七十八。

馆和书院,这些学校对于善乡俗、育人才,对于教育向普及化、平民化发展也起了一定的作用^①。

第二节 中国近代农村教育的发展

一、近代农村教育的发展

清代的地方行政区域是将县分为若干乡,乡分为若干图,各乡设乡董一至三名,各图设图董一至二名,乡董图董均由地方绅士选出,呈请县令委任。桥梁道路的修筑、河川的工事、慈善事业的经营、文教事业的发展等,都由图董商议,经乡董的同意后执行。图为最下级的行政区域,其范围以地方大小而定,有图长一名或地保数名,代理县令征收地租,报告强盗匪杀等事件于警局。一图之中富者为绅衿,一般农民及小地主为正身,正身皆被编制,依号担任地保任务(是强制实行的)。此外还有积谷、救恤、练局等组织。

光绪末年,准备立宪政治,采用农村自治制,曾经公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其范围是办理城镇乡的事务,如卫生、道路、工事、农工、商务、慈善、公营事业、自治经费的征收以及乡董认可的地方事业。至于组织,则分议决机关(议事会)和执行机关(在城镇为董事会,在乡为乡董)两种^②。

清末时期的乡村教育,有两个矛盾的现象,一是趋新,二是守旧。前者发现于沿海沿江接近城市的农村,后者代表内地和偏远地方的教育。当清末废科举兴学校的时候,东南各省纷纷设立学校,倡导者大多是富绅,因为他们有钱,有地位,容易号召民众。他

① 张传燧主编:《中国农村教育学》,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3页。

② 林金藻:《中国农村教育之研究》,台湾:正中书局1953年版,第2页。

们的动机多在趋新,他们认为邻村既有学校,本村也应该有学校,否则就没有“面子”。还有因为地方富庶筹款较易,地方官三番五次地劝学,也就渐渐开设学堂了。不过这时候的学堂,目的既不明确,办法也嫌笼统,往往模仿都市小学亦步亦趋,很少有地方性。至于偏远的地方,除了在城镇设立一两所学校点缀以外,乡村仍是私塾,即或有学校也多为变相的私塾。

1924年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科首先设立农村教育课程,聘请赵叔愚先生主讲,这是我国近代农村教育的先声。稍后江宁县立师范学校提倡勤劳朴素的学风,以适应农村的需要。江苏省立师范学校先后设农村分校。第一师范农村分校设在吴江,第二师范农村分校设在黄渡,第三师范农村分校设在洛社,第四师范农村分校设在栖霞山,第五师范农村分校设在界首。1926年,中华教育改进社发表改造全国农村教育宣言书,主张“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陶行知先生撰写了《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一文,开头就说:“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他教富的变穷,穷的变得格外穷。他教强的变弱,弱的变得格外弱。前面是万丈悬崖,同志们务须把马勒住,另找生路!”

这是陶先生个人的觉悟,也代表了中国教育界全体的觉悟。就在1926年的秋季,陶先生和赵叔愚先生以热忱和勇气筹设晓庄实验乡村师范学校,并于翌年春实现。同时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也感觉乡村教育比都市教育更重要,选定了河北定县作为华北实验区。

中国国民党很早就注意农民运动和农村教育。中山先生在1924年对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生说:这次国民党改组要加入农民运动就是要用农民来做基础,我们要把三民主义传给一般农民,使

一般农民都觉悟,都能明白三民主义,实行三民主义,我们的革命才是彻底,我们革命才能成功。他又在1924年7月28日对农民党员联欢会训词中,指示农民要自己组织团体以及主张“耕者有其田”、“地尽其利”。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农民运动决议案,关于教育方面的内容包括:1. 实行农村义务教育及补习教育。2. 利用地方公款,兴办各种农民补习学校。3. 尽力宣传,使农民主动地筹办各种学校。

除中国国民党和东南人士极力提倡农村教育和农民运动外,在北方,乡教运动或村治运动也勃然兴起。如王鸿一先生等在北京创办“村治月刊社”,梁耀祖先生等在河南设立村治学院,彭禹廷先生在镇平以民国为自治中心,华洋义赈会在河北倡导农村合作事业,梁漱溟先生等在邹平设立乡村建设研究院,以及南北各省设立实验县、乡村师范学校、乡村教育实验区、乡村改进区等等。

20年代中国近代农村教育经历了从乡村教育运动到乡村建设运动的转变。乡村建设或农村改造实际上是广义的乡村教育,考察中国乡村教育运动的历史进程,这种广义的乡村教育运动发生较迟,最初的乡村教育运动其内容侧重乡村学校教育或正规教育,如要求为乡村小学专门培养师资,设立乡村师范学校,要求地方教育机关重新划分学区,增设乡村小学,要求编定农村教材,更改学历假期等等,这些都是早期乡村教育运动所特别关注的事情。至于学校以外的事,他们关注较少。自从晓庄师范设立以后,经过陶行知先生等人的倡导,乡村学校要做改造乡村社会的中心,乡村教育的范围逐渐得到了扩充。后来,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江苏所办的农村改进事业,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工作,都注重整个的乡村社会的改造,以教育为骨干,有的乡村小学还兼办合作社、示范农场、卫生所、敬老院、托儿所等。

为什么从单纯的乡村教育运动,扩大到乡村建设运动呢?主要有两大原因:(1)受了“社会本位教育思潮”的影响;(2)根据乡

村实际的要求。

当时国内学者颇有人提倡“社会本位”或“民族本位”的教育。梁漱溟先生曾草拟《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一文，他主张“在改造时期，要完成社会改造的教育，其异于平时教育设施的人，殆有下列的根本点：第一，社会改造期的教育宜着重于成人，与平时教育的注重在社会未成熟分子不同。第二，社会改造期的教育宜着眼于一般社会，与平时教育每囿于少数个人不同。第三，社会改造期内的教育宜就其人所在环境行之，与平时恒设为特殊环境以超于现实大社会环境的人不同。”至于“个人本位”的教育哲学，其价值早已被人否认了。我国乡村教育受了这种“社会本位”教育哲学的影响，所以它的着眼点自在改造乡村社会，而不在发展个人。简言之，从前单纯的乡村教育设施是发展个人的；现在盛大的乡教或乡建运动，它的目的，则为改造社会，或以民族主义为根据。

为什么说它是根据乡村实际的要求呢？这可以分两个方面说：从教育者方面说，知识分子下乡以后，才觉得教育不是孤立的，不是可以唱独脚戏的，它非联合政治、经济、社会各种力量，否则不易奏效；所以主张“政教合一”或“富政教合一”，而将教育的范围扩大起来。从受教育者方面说，乡村人民领袖缺乏，生活太苦。因为领袖缺乏，知识分子可以大展身手，只要是稍微坚实一点的分子，立刻可以把群众凝聚起来（当然，愚惰油滑的分子是不能做乡村工作的）。结果，群众需要他，他也需要群众，而成为事实上的领袖。于是，这位先生就够忙了！看信写信要请他，排难解纷也要请他，农民生活上一切不能解决的事，都要请他了，并不是他要揽事，而是事情自会来找他。又因为农民生活太苦，所以一个教育机关设立以后，农民们听到许多解除痛苦的“温语”，就怀了无穷的希望常常要来请教“先生”，于是“先生”就做了他们的“顾问”，学校的事务也就忙起来了。——这是事实上不容你关门办学。

基于上列两点，由单纯的乡村教育运动扩大到乡村建设运动

就成了一种普遍的趋势。

二、全国著名乡村教育实验机关概况

(一)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1. 沿革

1929年,王鸿一、梁耀祖、彭禹廷、梁漱溟、孙则让、王怡柯等在河南办省立村治学院,想把他们从前在北平办《村治月刊》时的主张拿来实验。后因河南政局变动,村治学院不到一年就停办了。那时候恰好山东省政府很想关注乡村建设工作,梁漱溟先生等被邀请到山东奉命筹设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该院于1931年春成立,院址设在邹平。后来山东省政府又先后划邹平、菏泽、雨县为实验县,归研究院指挥,实验县县长由研究院提请省政府加委。所以研究院一方面是一个学术机关,另一方面也是一个县政执行机关,直属山东省政府管辖。

2. 宗旨

研究院设立的宗旨是“研究乡村自治及一切乡村建设问题,并培养乡村自治及乡村服务人才,以期指导本省乡村建设之完成。”简而言之,研究院的目的是:(1)研究村治理论;(2)培养村治人才;(3)推动乡村建设。它有两种特殊意义:一是倡导知识分子下乡,为学术界开风气;一是要本地人办本地事,扶持乡村力量。所以研究院分设研究、训练二部,研究部是为前一种目的,训练部是为后一种目的。关于研究院设立的意义,梁漱溟先生在他所作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宗旨及办法概要》一文里,说得很详细,现在摘录如下:“在都市过剩的知识分子,好像没用;然而下到乡村来,其作用自现。即使最无知识能力的,在乡间至少也有两种伟大作用:(1)乡村最大的弊端是愚昧,知识分子下乡至少可教人识